

杜荀鹤诗集版本源流考述

汪 长 林

杜荀鹤字彦之，号九华山人，唐末池州石埭（今池州市石台县）人，工于草字，善为吟唱，为唐末著名的写实诗人。生前即有顾云作序的《唐风集》三卷行世。顾云序云：

大顺初，帝命小宗伯河东裴公掌邦贡。次二年……，于郡进士中得九华山人杜荀鹤，拔居上第……。明年，宁亲江表，以仆故山偕隐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凡三百篇……。于戏！旌别淑慝，史臣之职也。仆幸为之叙录，乃分为上、中、下三卷，目曰《唐风集》。视其人齿尚壮，才力未尽，讴吟之兴方酣。俟其继作得如《周颂》、《鲁颂》者，别为之次序。景福元年夏，太常博士、修国史顾云撰序。

是集盖杜荀鹤中第回乡后所自编^①。从顾云作《序》的时间看，当成集于890年秋至892年夏，且仅收五七言近体诗，与传世诸本所存相合。

杜荀鹤诗结集后，历代官、私书目多见著录^②，承继有绪。据今所考其自编的原集早已散佚，传世诸本皆源于宋人的整理^③，并在传承过程中使其有了明显的版本分歧，形成了分体、不分体与总集三种不同的版本体系。

—

所谓分体本，乃指按诗的体裁来分次编辑而成的本子。其编辑次序大抵首列顾云《序》，再为目录，最后依五、七言及绝句依次排列。传世的汲古阁《唐四名家集》本（以下简称毛本）、明末冯彦渊家抄本、清初抄《百家唐诗》本、《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刘世珩《贵池先哲遗书》本（以下简称刘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聂夷中诗 杜荀鹤诗》本等，尽管互有出入，但均属这一体系。冯彦渊家抄本册后有冯武题跋：“此吾家藏南宋版抄本，癸卯（1663年）春仲借得隐湖毛氏北宋版细校一过，异同处悉两存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刊本乃以刘本为底本，刘本与四库本又都直接源于毛本。因此毛本的来源问题也就成了考察分体本源流的关键。

据瞿镛：“汲古毛氏所刊用南宋分体本。”^④又陆敕先云：“世传分体《唐风集》俱出南宋本。余尝假钱遵王本校过，藏诸家塾。”^⑤钱遵王所藏的《唐风集》乃南宋陈解元的书棚本（《读书敏求记》），说明毛本所用的“南宋分体本”，并不是陈解元的书棚本。今以遵王所述与毛本相较，则知二本之间虽同属分体系统，但仍有一定的差异：从遵王述其书棚本《唐风集》与北宋本《杜荀鹤文集》时未提顾云序文的问题看，说明两个传本《序》的文字盖相差不大，不然则自当提及。此其一。陆敕先与毛晋乃儿女亲家，又与子晋、遵王同学于牧翁，其交谊自非一般。但陆氏仍有“余尝假钱遵王本校过”之言，可知子晋所依的底本定非遵王的原本，不然陆氏也就无须再有什么“校过”之举。此其二。万曼《唐集叙录》云：“傅沅叔曾由徐梧生处得到一个明写绵纸本《唐风集》……是属于南宋书棚本的系统，和毛刻同源”云云。则知毛本虽不直接源于书棚本，但其所用的底本却是“书棚本的系统”。也就是说毛本是间接地采用了书棚本。因此，分体本的最源头在南

宋本，与北宋本无关，而且均直接或间接地源自陈解元的书棚本。

尽管“世多以毛子晋汲古阁刊本为最佳”^⑥，但其舛误处仍然不少。如将顾云序中“出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刻作“出诗三百篇”；在“仆幸为之叙录”下夺“乃分上、中、下三卷，目曰《唐风集》”一句；于“《周颂》者”后却缀上“目之为《唐风集》”；于“《周颂》”下夺“《鲁颂》”等八字；结尾漏刻了“景福元年夏太常博士修国史顾云撰序”一语，却缀上“荀鹤干谒梁王朱全忠”等六十四字，致使文不相属——“盖旧本《唐诗纪事》载云此《序》，误连下条荀鹤初谒梁王云云六十四字为一条。晋不察而误并抄之，殊为疏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如此，然从常见的顾云序文的几个传本都不尽相同看：毛本与席刻有别，《全唐文》所载与王运熙、杨明著《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所录亦不尽一致。则毛本的问题当是其所因底本原来就是如此，子晋不过是因袭了而已。只是“汲古毛氏所刊用南宋分体本”，而与之有交的几位藏书名家如遵王、胡震享、季沧苇诸人又都曾藏有分体本的宋槧。因而子晋之失，即在跋文中对此不应只字不提。但从问题的另一面看，其于客观上却也真实地为后人保存了宋本的原貌，——包括宋本的某些舛误。

今传世的分体本多源自毛本，但各本亦非全照毛本之旧。如对顾云的序文，四库本即对毛本作了纠谬。刘本虽以毛本为底本，但同时又校以《全唐诗》。凡毛本少收之诗及断句均以附录的形式辑补于书后；凡他本与毛本相异者均以双行小字注明于下；又依四库本删除毛本中顾云序文末尾讹误的六十余字；于“目之为《唐风集》”后补上“老而益精，留次序。景福元年壬子夏述”。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刘本排印时，将刘本中辑录的佚诗依体分属各卷之末，显有改进，但却未收刘氏辑录的断句。其《前言》虽称“对原刻本中的文字误脱或异同之处，都作了必要的说

明”，然其舛误、臆断处仍然很多。如《题唐兴寺小松》“向客满襟风”之“满”字下，注文脱“《全唐诗》注云”五字；《与友人话别》的“千人无易颜”之“千”字下，只注《全唐诗》作“干”而未及刘本；《送九华道士游茅山》中“忽起他山兴”之“他山”，《全唐诗》作“地仙”，刘本为“地山”（显然，刘本乃误“仙”作“山”），排印本于此亦无只字说明。至于顾云序文，刘本参照他本补注达二十一处之多，排印本仅只保留了“名犯文宗庙讳”一条注文。刘本于“目之为《唐风集》”下补有“老而益精……”等十五字，排印本并不见录。有些字词如“偕隐”作“借隐”、“塞诏意”作“塞诏”、“勉为”作“竟勉为”等等，亦不及刘本之善。又于《唐风集叙》后以小字注云：“按原刻本下有荀鹤初谒梁王朱全忠……今特删除。以还旧。”但既然排印本乃“用贵池刘氏刻本作底本”（《前言》），而刘本业已据《四库全书》本将此删除，则此注显属多余。因此，比短量长，此本虽为晚出，却难及前本之善，殊为憾事。

此外，该体系传本中著名的还有诸如：竹深堂精抄本。此本莫友芝称其于张志处见过（《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但所言不及张金吾详。张氏云：“《唐风集》三卷，精抄本，钱履之藏书。……卷首有钱履之读书记印记，板心有‘竹深堂’三字。”^⑦“竹深”乃履之七世祖钱洪的号。据《常熟县志》：“洪字理平……能诗好客，洪爱种竹，堂曰‘竹深处’。”履之乃牧翁从祖弟，其人“早失怙，辟怀古堂以奉母，帘户静深，书签错列，年五十余遭世乱，坎壈不得志卒。”又牧翁亦言，履之“幼失祖父，母徐守节自誓。先君官保公翼而长之，故履之虽从祖弟，犹吾弟也。……友人程孟阳精于论诗，少所许可，独履之诗，以为鲜妍和雅，妙得近体之法。”（《列朝诗集小传》）据此可知这个抄本当属难得的珍本。此本是否出自遵王的书棚本已不得而知。但从二家的关系渊源看，即使不是同出于一个底本，至少也应该互校过。万曼先生认为此本乃

“影抄南宋的书棚本”^⑧，当足资信。毛扆、敕先的合校本，其册后有陆氏跋云：“斧季较后，余复勘一过。十一月廿五日识于汲古阁。”

又傅增湘先生述其曾见过一部明代的绵纸抄本。云：“原书藏徐梧生监丞许，凡唐诗二十余家。余从其婿史吉甫编修假得之。”这里虽未言明此本抄者为谁，但沅叔经过比勘后赞其“不独远过席刻之上，即季抄号称名帙者，比短量长亦逊此一筹矣。”^⑨足见此本之善。沅叔所见之席刻乃属不分体系统，下文再叙。至于季抄，今虽下落不明，但从沅叔称其乃“汇集各本择善而从，故佚诗异文往往比别本为多”，且怀疑《全唐诗》即取资于此看，由于《全唐诗》乃分体编次，可知季抄本也应属于分体本系统无疑。检沧苇《延令宋板书目》有“杜荀鹤《唐风集》上、中、下三卷一本”，与今传季藏《杜荀鹤文集》相比，不但集名不同，且各卷卷名也有别——《杜荀鹤文集》作“卷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可知二者并非同一传本。《杜荀鹤文集》属不分体系统，则《延令宋板书目》之《唐风集》当属分体系统。据周星诒原辑、罗振玉重编《传忠堂书目》还记有叶氏蓁竹堂钞本，云“《唐风集》三卷二册。唐杜荀鹤撰。叶氏蓁竹堂钞本”等等。只是这些抄校本今天已很难觅其踪迹了。

二

杜荀鹤诗集的另一版本系统的特点是以“杜荀鹤文集”为集名，将“唐风集”三字注于其下，编诗次第不依诗体而行，或为一卷，或作三卷——各卷收诗数量大致相当。今传最具代表性的本子当属席刻《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以下简称席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杜荀鹤文集》本（以下简称上图本）。

康熙四十一年，席启寓将所编《唐诗百名家全集》付梓，其中即有杜荀鹤诗集。叶燮序云：“先生壮岁官于朝，即陈情乞归养。高卧家园，以著述为己任。暇日出其篋衍所藏唐人诗，自贞元、元

和以后时俗所称为中晚唐人，得百余家，皆系宋人原本，一一校讎而付之梓。”遗憾的是启寓竟卒于该集付梓的当年，其后人又屡因迁徙，直到光绪年间才得以刊刻完毕。其七世孙素威跋云：“咸丰间，家大人惧先世手泽就湮，重加修补校刊。既竣，未及印行，而庚辛之乱作。凡经史书版之在苏垣者十毁七八，幸是版什袭家中，与敝庐俱无恙。然迭遭寇扰，残缺又多……独此版历二百年之久，卒能补苴掇拾完美如新。”可知，一是席刻底本“系宋人原本”；二是尽管此本刊行于光绪年间，但其书板则是刻成于“乱作”之前的咸丰间，故而其底本仍应“系宋人原本”无疑；三是该板虽屡遭世变之扰，但却未遭毁灭性的灾难，故“卒能补苴掇拾完美如新”以存宋本概貌。然此宋本是南宋本还是北宋本却未言明。

今检席本，其中以“杜荀鹤文集”为题者仅见于顾云序，余皆以“杜荀鹤诗集”为名。又《目录》中漏录《塞上曲》至《赠隐者》凡48首诗题。校以上图本，其诗的编排次序除《献长沙王侍郎》至《冬末投裴侍郎》8首外，余皆一致。上图本收诗凡316首，《目录》中漏目二，存目三；席本收诗凡318首，《目录》中无存目，却漏目48。此外，席本中有些字词，诸如：“名姓暗投心暗祝”之“投”不作“头”（《乱后出山逢高员外》）、“一枝何校一年迟”之“枝”不作“枚”（《酬张员外见寄》）、“九土雄师竟如何”之“土”不作“士”（《献新安于尚书》）、“深要使君知”之“君”不作“老”（《送人牧江州》）、“哭贝韬”之“贝”不作“具”（《哭贝韬》）、“吾道在五字”之“五字”不作“吾子”（《秋日怀九华旧隐》）等，凡十余字虽与上图本相异，但更为合理。校以《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席本于“叙录”亦不作“序录”，“池禽浴动荷”之“浴”不作“欲”，“归湘中”不夺“归”，则与上图本一致。由此可知，席本与上图本应属同一系统，至于少数字词的差异，当属席本的“补苴掇拾”之功。

上海图书馆藏《杜荀鹤文集》，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出版，装帧为一册，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其收入“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出版，在《影印说明》的前一页印有“据上海图书馆藏宋蜀刻本影印版框尺寸悉准原书”字样。册首有上海图书馆、朱学勤、徐乃昌、季振宜的藏书印，册后有季振宜、毛晋、王闻远、朱学勤、黄子羽的藏书印，书后另有季振宜的题款：“泰兴季振宜沧苇氏珍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说明》云：“宋蜀刻本唐人集二十三种，可分为三个系统：一为北宋或南北宋之际的刻本，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世称十一行本；一为南宋中期刻十二行本，行二十一字；一为南宋中期刻大字本，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三系统各本的存佚情况如下：一、北宋或南北宋之际刻十一行本：……二、南宋中期刻十二行本：……（十九）杜荀鹤文集三卷唐杜荀鹤撰。全。……”潘景郑《杜荀鹤文集跋》云：“此宋蜀刻本《杜荀鹤文集》三卷亦经毛氏皮藏，有汲古阁藏印。……是集清初从毛氏归季振宜，今归上海图书馆。”根据《影印说明》、潘景郑《杜荀鹤文集跋》以及藏书印记看，此本的流传情况似乎已有了基本的脉络，即南宋中期蜀刻十二行本，中经毛晋、季振宜、朱学勤等人的皮藏最后归上海图书馆。但南宋蜀刻本是否即为南宋人直接整理？上图本是否为南宋蜀刻原本？等等，仍须作进一步的考索。

从现存资料考察，追寻宋蜀刻本的传承情况均须涉及毛晋与季振宜等人的收藏情况。依前贤所述汲古阁于宋本《杜荀鹤文集》当有三个不尽相同的本子：一是黄子羽的旧藏本，一是汲古阁抄本，一是汲古阁影刊本。

黄子羽旧藏本为北宋刊本。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述，此本卷末还有陆敕先手跋，云：“……卷后有陆氏敕先手跋云：世传分体《唐风集》俱出南宋本，余尝假钱遵王本校过藏诸家塾。毛斧季新得沙新黄子羽所藏北宋本既未分体，且多诗三首，与世

本迥异。偶过汲古阁出以示余，且以家刻本见贻，因校此本，携归识于灯下。壬寅仲冬二十八日陆貽典。”次年，冯武又借以校其家藏宋抄本《唐风集》（见上引冯武题跋）。此本今已不知去向。

又据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唐风集》三卷，杜荀鹤撰，毛晋刊本，太常博士顾云作《序》。《郡斋读书志》：‘杜荀鹤《唐风集》十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唐志》不载。此本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载同。曾云：此宋本，仍名《杜荀鹤文集》，而以‘唐风集’注于下。”

又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百〇八云：“《唐风集》三卷。唐杜荀鹤撰。钞本。前有顾云《序》。《敏求记》云：予藏九华山诗是陈解元书棚本，总名唐风者。后得北宋缮，乃名《杜荀鹤文集》，而以‘唐风集’三字注于下。《通考》云‘《唐风集》十卷’，‘十’字恐误。此本为虞山毛氏所藏，想从北宋传录者，与述古堂写本同出一源。诚可珍也。”耿氏所述与孙星衍大致一样，这里《唐风集》即为《杜荀鹤文集》。所不同者乃孙氏云为“毛晋刊本”，而耿氏则云其所见乃“钞本”，“为毛氏所藏，想从北宋传录者，与述古堂写本同出一源”。

顾广圻《思适斋书跋》亦云：“《杜荀鹤文集》三卷。景宋抄本。此本为虞山毛氏所藏，想从北宋传录者。与述古缮写本同出一源，而钞手工整。虽非景宋，已迥胜世俗流传之本矣。”顾氏所谓“景宋抄本”与“虽非景宋”，其意盖谓是本乃间接影宋而非直接影宋本。此本后为陆心源所得，其《皕宋楼藏书志》卷七十一所记，大体是照录了顾氏跋文。但值得注意的是，陆氏在《杜荀鹤文集》下的注文却是“影写南宋本”，较顾氏之“景宋抄本”更为具体。依耿、顾、陆三人所述，则汲古阁所藏的这个抄本乃是以影写南宋的传本为底本进行影抄而成。——据称，子晋每遇“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购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抄。于是一时好事家皆争相仿效以资

鉴赏，而宋槧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⑩惜其抄本今已不传，前辈见之者又述之不详，故而已很难考见其原。据孙星衍、耿文光、顾广圻、陆心源所述，则遵王的北宋缮写本应是依北宋本而缮写的本子。缮写者为谁虽不得而知，但它与子晋所藏乃同出一源则是无疑。同时，子晋所藏的抄本虽与遵王的藏本同出一源，但二者之间却无直接的承继关系也很显然。综合三家所述并参以陆敕先手跋看，则汲古阁于此不分体本《杜荀鹤文集》，是既有自刊本，又有一部先从北宋传录至南宋，再以据此本而影写的一部影宋抄本为底本进行影抄的本子，其后还求到黄子羽的旧藏本。

季振宜藏《杜荀鹤文集》（以下简称季本）或以为即是黄子羽的旧藏，然从有关资料的考察来看，当属汲古阁的影刻。

沈津先生《记宋本〈杜荀鹤文集〉》亦云：“此本卷三末有‘泰兴季振宜沧苇氏珍藏’题款一行。经藏毛晋汲古阁、黄翼圣莲蕊楼、清初季振宜、王闻远孝慈堂、汪宪振绮堂，同治年间流入朱学勤结一庐。”^⑪“宋蜀刻本唐人集传世有十一行、十二行本之分。……十二行本……约刻于南宋中叶。此本亦为十二行本系统，即毛扆、朱学勤所称之北宋刻本。”^⑫但检《别本结一庐书目》“宋版”类，云“《唐风集》三卷。北宋刊本。四册。”又《结一庐书目》卷四云：“《杜荀鹤文集》三卷，计四本。唐杜荀鹤撰。北宋刊本。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黄子羽旧物也。册首有毛子晋、王烟客、季沧苇、汪鱼亭诸家收藏图记。”叶德辉《结一庐书目序》：“朱氏有《结一庐书目》四卷，编次极精，每书下注明板刻年月，钞藏姓名。惜只传钞本，不能与海内共读也。余因再三校阅付之手民……。光绪辛丑夏五五日湘潭叶德辉序。”又据《别本结一庐书目序》：“惟此本不逮刻本者，刻本于各书、刻工时代、校勘人名一一详注。此则多从简略。疑为初次编撰，非定本也。”二家序文说明二部书目均出自朱氏之手。显然，沈、朱二家均以为所记乃子羽的旧物^⑬。沈津先生既云季藏本于“同治年间流入朱

学勤结一庐”，但《结一庐书目》所记的季藏《杜荀鹤文集》仅有一本，别无他册，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上有结一庐藏书印记，说明沈津先生所见，朱氏所藏，上海古籍出版社籍以影印的底本当属同一传本。

然而朱氏云是集册首有王烟客（王时敏字烟客）与汪鱼亭（汪宪号鱼亭）之印，却未提王闻远之名，与沈津先生所述不尽一致。又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记，子羽的原藏本有二个重要标志：一是，“卷后有陆氏敕先手跋”；二是，黄子羽藏本收诗比分体《唐风集》要多出三首。检上图本卷后不见有陆敕先手跋，且收诗数量（316首）比毛本（317首）不是多出3首而是少收1首，因而也就难以断定它就是子羽的旧物了。但此本卷末又有黄子羽之印，说明它与黄子羽藏本又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

从陆氏手跋中又知子羽藏本乃毛斧季的“新得”而与子晋无关，因而此本的藏书印记似应用斧季的比用子晋的更为合理；从时间上看，壬寅为康熙元年（1662），距毛晋逝世已有三年——子晋卒于1659年7月27日，先子羽而逝（子羽卒于是年10月8日）——子羽对其所珍藏的北宋本在其生前竟出让与人的可能性当不是很大。

据上述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所记：一、他所跋的这个本子与遵王的缮写本乃同属一个版本系统，他只是用了“唐风集”作题，而未用“杜荀鹤文集”作题而已——朱学勤《结一庐书目》与《别本结一庐书目》所述相同；二、该传本乃毛晋汲古阁的刊本，而非其他传本。又据陆敕先手跋所述，由于陆氏已藏有分体本《唐风集》，故而此处所谓“家刻本”当非《唐四名家集》本之《唐风集》，而应是毛刻不分体本《杜荀鹤文集》，与孙星衍所述相比照，说明毛晋生前确曾刊刻过不分体本。

从上图本乃刊本而非抄本，上面既有黄子羽的印记，也有毛子晋、季沧苇的朱印看，其刊本盖即以黄子羽的藏本为底本。因

为子羽后子晋而卒，则斧季之“新得”当在子羽卒后。说明子羽的这个藏本子晋不曾拥有过；而曾为季振宜所藏的这个本子上有子晋的朱记却不见斧季的藏书印记，则此本当不属斧季之“新得”。以此，极大的可能就是子晋曾假借子羽的藏本进行过影刊，并印上子羽印记以示所据。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记，校以上图本，则黄子羽原藏本中的“序录”不作“叙录”（顾云《序》），“池禽欲动荷”之“欲”不作“浴”（《和吴太守罢郡山村偶题》），及“《送人遇乱归湘中》”夺一“归”字，其余皆同，可见二个传本确实是同出一源。而从上述差异中，上图本更为合理看，可能要归功于汲古阁的校改。至于毛本收诗比上图本多出一首，当属汲古阁漏刻之失。

三

《杜荀鹤文集》除上述二个版本体系外，于明清之际还有个独成一体的“总集”本系统存在。它们不收顾云《序》，而代之以作者的小传；于每卷之前不标“今体”或“杂诗”字样。这一体系中有明末胡震亨编辑的《唐音统签》本，清初季振宜编辑的《唐诗》本，康熙时御定的《全唐诗》本及乾隆时李调元编辑的《全五代诗》本等。由于《全唐诗》及《全五代诗》流布广而影响大，故而于这一体系中更具代表性。

《唐音统签》乃胡震亨（1569～1645?）所编著的一部唐五代诗总集。胡夏客说：“先大夫孝辕府君搜集唐音，结习自少。至乙丑岁（1625）始克发凡定例，撰统签一千卷。阅十年，书成。”是集全帙今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其甲、乙、戊、癸四签为刻本，丙、丁两签刻而未全，余皆属范文若之抄配。杜荀鹤诗被辑入《统签》卷七百五十六至七百六十之《戊签余六》，为《四库存目丛书》所收。是集卷首有七十五字的诗人小传，又从顾云《序》、《瀛奎律髓汇评》、《北梦琐言》等中摘录有关杜荀鹤资料达二百七

十九字。胡氏编诗次第：五言律诗一（69首）、五言律诗二（56首）、五言排律（2首）、七言律诗一（67首）、七言律诗二（73首）、七言排律（1首）、五言绝句（4首）、七言绝句（50首），共计收诗三百二十二首。其中补诗二首——七绝《无云雨诗》据《洞微志》补，《自江西归九华》未标明据何本所补。又辑有断句八句。说明胡氏编辑杜荀鹤的诗当是依本而行。

季振宜的《唐诗》乃以牧翁《唐诗》手稿为基础编辑而成。其《唐诗序》云：“顾予是集窃有因矣。常熟钱尚书曾以《唐诗纪事》为根据，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诗。盖投老为之，能事未毕。而大江之南，竟不知其有此书。予得其稿子于尚书之族孙遵王，其篇帙残断，亦已过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周勋初先生在谈及《全唐诗》的成书经过时说：“胡震亨与汲古阁主人毛晋交好，季振宜也是大藏书家，当时能看到唐集很多善本，所以有人以为他们都曾选择各家善本作为底本而成书，实则他们多以当时常见本作底本，季书即以此剪贴而成书。”其所编杜荀鹤诗即以汲古阁刊印的《唐四名家集》本为底本剪辑而成，诗的次第以毛本为基准。补诗八首，除《乱后送友人归湘中》、《送紫阳僧归庐岳旧寺》注明“接写”于《维杨冬末寄幕中二从事》后，《和吴太守罢郡山村偶题二首》当“写《赠李蒙叟》之后”外，其余四首绝句均附于卷末。季氏于毛本原有317首诗的基础上补以8首，达325首。与《统签》相比：《自江西归九华》及八句断句，《统签》已收而季本无；《和吴太守罢郡山村偶题二首》、《醉书僧壁》、《寄李隐居》等4首，《统签》缺而季本均已补入。可以看出，胡、季两家之间不存在前后承继性关联。季本盖为初稿，故将毛本中顾云《序》删去后对杜荀鹤的小传尚未补出。又将毛本第一首《春官怨》用墨笔划掉而未作任何说明。季氏此书现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以《全唐诗稿本》为名影印出版。

康熙四十四年，曹寅奉敕据胡震亨《唐音统签》与季振宜

《唐诗》在扬州设局增修为《全唐诗》。就杜荀鹤诗而言，沅叔曾怀疑《全唐诗》即取资于沧苇的一个杂抄本，云“吾颇疑季氏钞本乃汇集各本择善而从，故佚诗异文往往比别本为多，其后《全唐诗》之辑即取资于是焉，然得失时不免杂出。”^⑭沅叔曾以一明抄本与季抄本对校后，将一些为季抄所无的“佳异之字”（计32字）一一列出。今以此“佳异之字”与季氏《唐诗》相校，除了“自见来如此”（《赠庐岳隐者》）、“一望一苍然”（《秋夜晚泊》）之“苍”、“便是命羈人”（《哭刘德仁》）之“羈”等不作“见说来居此”、“枪”、“寄”外，其余均与沅叔所见之明抄本一致。以《全唐诗》本与之相校，《全唐诗》本除保留了上述季本内容外，还于“只将波上鸥为侣”之“鸥”不作“沔”（《统签》本、《全五代诗》本、不分体本《杜荀鹤文集》等均作“鸥”）。说明季抄本与季氏《唐诗》本及《全唐诗》本相差较大，《全唐诗》本乃直承于季氏的《唐诗》而非沅叔所见的季抄。沅叔盖未见季氏《唐诗》原本，故有此臆猜之误。另外也说明，曹寅他们在编辑杜荀鹤诗时，并非机械地照抄季氏原本，而是进行了一番比勘择善的工作。

这个体系中有影响的另一传本当推李调元的《全五代诗》本（以下简称李本）。

《全唐诗》问世后不久，李调元于乾隆乙末年（1775）春二月至戊戌年（1778）春正月，历时三年而编成《全五代诗》。其《凡例》称：“五代诗人最著者，梁之杜彦之，……皆大家也，诗固全录。”又云：“杜撰无徵，素心所鄙。是书采用书目凡三百种，今并列左方以便考订者互相查对。”可见其谨慎之至。检其《编引书名》，有《唐风集》、《全唐诗》、《唐音统签》、《唐音戊签》、《唐音癸签》等。以李本与《全唐诗》本、毛本、《四库》本相较，其虽同属分体编次，但在具体排次上不仅差异很大，且在收诗数量上亦有不同。李本收诗凡304首，毛本、《四库》本所收凡317首，

《全唐诗》本则收有 326 首。在诗的编卷上差异也很明显，它本皆接近体五言、七言及绝句而别为三卷，然李本则是五言为一卷，部分七言（96 首）为一卷，将部分七言（44 首）与五、七言绝句编为一卷。在诗人小传的处理上，李本与《全唐诗》相差也较大：《全唐诗》于“知制诰”下有“恃势侮易缙绅。众怒，欲杀之而未及”，结尾有“今编诗三卷”等语，李本不录此语，但却于“《唐风集》十卷”后补以“《洞微志》……”云云，凡 480 余字（均采自有关稗史、诗话），则为《全唐诗》所无。在文字方面，也时或有其特异之处。如“少见修行德似师”（《题觉禅和》）之“德”不作“得”。又如“未如耕钓门分明”（《献长沙王侍郎》）之“门”不作“口”（按《丛书集成》本仍作“口”，今从光绪本作“门”）。“门”乃“垆”之或体（见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林义光《文源》），有远野之意。细味二者之别，作“门”似乎更为合理。何光清先生曾疑它本作“口”有误，是有道理的（见何光清点校《全五代诗》卷三）。李氏在编辑时既是“全录”，又参考了《全唐诗》、《唐音统签》诸书，而其书与它本相比竟出入颇大，于此则不难看出，李本之所以有别于它本，盖因其所采用的底本与它别有别。从版本学言之，这种对底本的珍视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另一方面，李氏在吸取前贤与时贤的成果时，总是将之纳入自己的编辑体例中去，从而使其所编之内容又具有了新的相对完整的独立意义，而自成特色。

在上述各体系的传本中，若是从保留旧槧的风貌上讲，毛本、席本及李本，无疑都是极具版本学价值。至于那些以别集的形式流传的各种抄校本或刊本，因它们或是宋元旧槧、或是据旧槧影写、影刻，或是校勘精工，或是出自名家里手等，因而它们在内容上自然是各有所长，但为了保存旧版风貌，也不能不各隐其短。它们虽颇具校勘学与版本学意义，但更多的则是有如汉印、宋砚，自身虽难以完美，但却独具珍藏价值。故而为弄藏家们视若珍奇，

务求插架。然而若从传播推广的角度讲，则远远不及《全唐诗》。《全唐诗》虽疏于注明所依各本的出处而成为遗憾，与其他本子相比，自不能独揽“精”、“善”二字，但其收诗最多，又非盲目而从，故于一“足”字则是当之无愧的。

注：

①潘景郑：《杜荀鹤文集跋》、杨军先生《唐人别集提要（孟东野诗集、窦氏联珠集、张司业诗集、唐风集）》均以为《唐风集》三卷为顾云编辑。

②潘景郑、杨军两位先生以为杜荀鹤诗集“新、旧《唐志》均未著录”云云，似有不妥，因为《旧唐书·经籍志》乃据毋煚《古今书录》所编，收录图书仅至于玄宗时代，因而也就不可能涉及到《唐风集》的著录问题。

③参见拙文《杜荀鹤诗集两宋存目考》，刊《安庆师院学报》第1999年第1期。

④⑤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

⑥刘世珩：《唐风集》跋，见《贵池先哲遗书》第七种。

⑦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十九。

⑧万曼：《唐集叙录》。

⑨⑭傅增湘：《校明钞唐风集跋》，见《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二。

⑩《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四《影宋钞经部·周易辑闻》。

⑪沈津先生所谓“经藏毛晋汲古阁、黄翼圣莲蕊楼”云云，似乎此本先藏汲古阁，再藏莲蕊楼。但据陆敕先手跋及黄翼圣比毛晋早卒三年看，当是先藏莲蕊楼，再藏汲古阁。

⑫沈津先生所谓“毛扆、朱学勤所称之北宋刻本”云云，今检《汲古阁藏书目》毛扆的资料，并未见有毛扆对此《杜荀鹤文集》版本情况的考辨文字。据陆敕先手跋看，“毛扆”当为“陆敕先”之误。

⑬潘景郑《杜荀鹤文集跋》、杨军《唐人别集提要（孟东野诗集、窦氏联珠集、张司业诗集、唐风集）》亦同。

作者工作单位：安庆师范学院科研处